史海钩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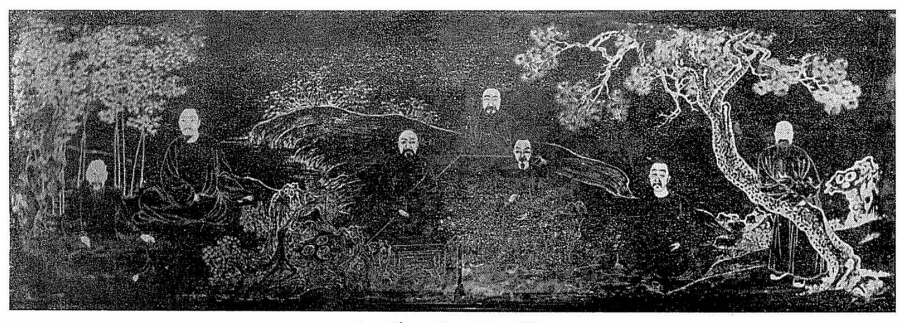
两江总督上云台

陶 澍 像

□ 胡可明

两江总督是清朝九位最高级别的封疆大吏之一，总管江南省(今江苏省及上海市、安徽省)、江西省的军民政务，官秩正二品。道光年间，两江总督陶澍(晋加太子少保街，官秩从一品，与中央各部院尚书平级)因主持淮北(今连云港市境)盐法改革，两次登临云台山，其主要过程《云台新志》《陶澍集》等史料均有记载。江苏地界最高官员，两次登临江苏最高山峰，必有不凡之举与不俗遗留。

巍峨云台山，“内以丰禺荚（盐业）万年之利。”历史悠久的淮盐，向对国家社会贡献巨大。但清代乾隆朝后期历嘉庆朝至道光朝前期，沿袭明朝的食盐运销纲盐法已不适应盐业发展而渐成桎梏，加上朝廷对淮盐实行重税、淮盐产销区各级官衙对淮盐的层层盘剥、邻盐及私盐对淮盐销区侵灌加重，致使淮盐渐趋疲敝，几近崩溃。朝廷盐税收入、官府取之于淮盐的经费共计七百余万两银子难以收缴，以产盐为生计的穷苦灶户饥寒交迫。道光十年(1830)8月，陶澍以江苏巡抚补授两江总督，12月又获旨兼管两淮盐务，受命扭转淮盐危局。以改革派著称的陶澍大胆构思，先于淮北盐区推行促产促销具体措施，初见成效。道光十二年(1832)4月，他亲赴淮北盐区调查研究，以图对盐运制度从根本上除旧布新，激发淮盬重振雄风。


沧 浪 七 友 图
（七友是：陶澍、吴廷琛、朱瑮、梁章钜、顾莼、朱士彦、卓秉恬。图右侧依树站立者为陶澍）

道光给陶澍的题字

4月26日，他率其智囊团成员登上云台山周览盐池灶疃，访查灶户，酝酿、筹议盐法改革方案，其后果断实行了改革纲盐法为票盐法，一招制胜。

陶澍此次登临留有诗作《壬辰四月二十六日偕邹公眉谢墨卿暨诸同事登东海云台山作》。诗中用“却缘王海疏禺荚，欲引神山渡愿船”，表明自己此行是为寻求破解淮盬积弊之良方，增加国库进项，也让穷苦灶户日子好过。他的挚友林则徐、两淮盐运使俞德渊等一大批官员，皆以《次韵》和之。据谢元淮主修的《云台新志》载，陶诗及部分和诗，被石刻于云台山上。经过此番考察后，当年7月票盐法在淮北盐区正式实施。其后，他始终跟进盐法改革进程，及时调整部署，票盐法解除淮盬积弊之目的得以达成，淮北盐业重又焕发出丰产丰收、快运快销、裕国利民的生机。

道光十五年(1835)4月23日，陶澍率同僚再次来淮北，考察并解决票盐法施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与同僚二登云台山。他作诗《乙未四月二十三日重登云台山》：“又踏金牛顶上行，海风飞舄上蓬瀛。……长松连路三年别，却笑公髯雪已盈。”壬辰年首登云台山，与改革团队主要成员以黄海般宽阔的胸襟、海涛般奔涌的思维筹定了淮北纲盐改票的战略部署。此次再登云台，非常兴奋地与同僚们放飞盐法改革成功带来的喜悦心情。两次登临云台山间隔3年本不为长，但3年中全副身心扑在盐法改革上，现在互相对视，哈哈一笑，大家胡须都如雪花样白了。

明万历十五年(1587)建于云台山上的海曙楼，至清雍正时已毁。陶澍第一次登临即倡捐选匠，予以重建。他题写了楹联和《海曙楼铭》，说各地多有观日出处，“而皆不若云台山四面际海，于观日出尤奇。”

他第二次登云台山，为当年新修的位于三元殿东南的华严阁题名，并应士民乞请，题写“印心石屋诗荟”被石刻于崖壁。为一棵千年松树题名“蟠龙丈人”，且作《蟠龙丈人》长诗。诗言：“郁州之山滨海东，有松郁律蟠其中。蟠天蟠地蟠不已，势若老龙拔崖起……”。其解困淮盬破冰之气概堪比此松之气势。淮北盐区盐法改革的成功给陶澍带来了十分的喜悦，二登云台的活动范围扩大了许多，几乎留连忘返。

在攀登宿城山金刚岩后，将之题名为“仙人屋”。磨墨数升，题词石壁，作诗《题海州宿城山仙人屋》。将宿城要道之湖口岭(当地人称为虎口岭)改名为“留云岭”，作诗《海州留云岭》。建于明万历十五年的云台山青峰顶上的三元宫，有过值得僧俗同荣的历史。康熙朝重建，康熙皇帝赐“遥镇洪流”匾额。乾、嘉两朝均有重修记载。但经几十年风雨侵蚀，行将倾溃。陶澍第一次登临云台山时，提出要再修之，辐辏而至的淮盐商人竞相捐资，次年工程告竣。他此次见之，心情甚悦。云台山九龙桥上下的将军庙、茶庵，时久已废。陶澍二登云台后倡地方修复二处，后来分别题写匾额、楹联。他还为云台山南天门题匾云：“高镇南天”；作楹联云“义气干霄，近指白云开觉路；威声走海，遥凭赤手挽洪流”。颇有借物借景抒情之意。

谢元淮收录陶澍登云台山时所赋之诗及百余和者之诗，及陶来海州途中所作诗《沐阳道中》《晓发沐阳入海州》《海州道中》等，著为四卷，名《印心石屋》诗荟，雕版藏于海州石室书院。陶所作《蟠龙丈人》等诗及其碑文、所题“海曙楼”、高公岛名、海曙楼铭、仙人屋诗、玉女窗名、虹梁名、金刚石名、留云岭名等，均石刻于云台山上。

东晋人士陶渊明(365—427年)，世称靖节先生，有“不为五斗米折腰”之气概，辞官不做隐居桃花田园。他精于文字，享有“汉魏南北朝八百年间最杰出的诗人”美誉，其辞赋、散文亦异常优秀。对于这样一个文豪英才，他有否来过海州，史上向有争议。陶澍援据精博，确认陶渊明曾到过海州。二登云台的第二年觐见道光皇帝时，他呈报两次登云台山所见云台美景及淳朴民风，道光皇帝听后眼睛为之一亮，说：海州人素来带刀佩剑(好武)，还享得这般美景与桃花园何异！陶向海州士民转述了皇帝的惊讶与评价，海州士民兴奋不已，遂在法起寺左边建起了陶渊明祠堂，作为春秋祭祀场所，并捐资置田若干亩，以作偿付日后维修及供给守祠者衣食。陶澍应请作《云台山新建陶靖节先生祠堂记》。

陶澍为盐法改革两次登临云台山赋诗抒怀，密友僚属们热情作和，所有留下的这些文字，都对我们今天了解那一次盐法改革，研究其社会背景、改法过程及效果，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真实史料。同样重要的是，他的诗作、题字、楹联等，对推动本地域的文化繁荣发展也起了一定作用。

王同与海州题刻

□ 王绪华

王同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主政海州，其功绩地方志均有称颂。光绪《郯县志》载：王同致仕归，屏事息虑，超然物外……书法端庄遒劲，动与古会，碑碣摩榻，艺林宝重焉。海州地方志曰：王同暇时亲为篆书匾额碑记。王同的书法题刻堪称大家，为海州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

晚明的书法，其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可谓是“承前启后。”这个时期的书法以反对柔糜书风和追慕古代朴厚稚拙书风为主要任务，以张扬个性、表现自我、独抒性灵为宗旨的书法艺术思潮。这个时期名家辈出，如王铎、董其昌等。作为科举取士的必备技能，书法是绕不过去的基本功。如果你不能写一手漂亮、工整的小楷，连参加考试的资格都没有。王同在海州任职内留下众多精彩的题刻，足以说明其书法造诣，王同善楷、篆、草书，其在未至海州之前的1534年(时年32岁)，即篆书其父王尚絅《风穴赋并序》碑，在这通碑的碑阴则是记事碑，即《汝州千峰白云寺重修毗卢殿记》为王同楷体所书，现存于河南汝州风穴寺。

目前在海州地区已发现的王同题刻有：花果山水帘洞左侧的“高山流水”(1549年)，“神泉普润”(亦说非王同书)。清风顶南侧的“清风岩”(1549年)。花果山郁林观“飞泉”、“采山钓水、抹月批风”(1544年)。伊芦山的“高山流水”(1546年)，“含光”(1548年)、“奇泉”(1548年)、“云洞”(1548年)。孔望山的“归云飞鸟”(1546年)、“龙洞良宵月照”六言诗(1545年)。石棚山的“高行清风”。白虎山的“蓬莱庵”(1546年)；市博物馆东侧广场的“向朐门”。碑刻有“镇远楼记”(1546年)。“重建英烈祠碑铭”(1548年)，“哀孝妇”诗碑。有内容记载无误的有“海州儒学贮书记碑”“海州蔷薇河纪成碑”(1545年)，“海州官职提名记碑”，连云孙家山的“嘉靖乙酉夏至，海州郡守王同，公出到此题名，备倭熊恩，胡思忠也”(1549年)。王同题刻字体涵盖榜书、楷书、行书、篆书、草书。现就王同的书法艺术作简要赏析。

大气磅礴的榜书

大气磅礴的榜书，古称“署书”，多用以题署宫殿匾额。王同偏爱大字，海州多山，以山为纸，王同在海州留下了不少榜书题刻。海州孔望山龙洞西侧的“归云飞鸟”。花果山郁林观的“采山钓水、抹月批风”，石棚山的“高行清风”，伊芦山的“高山流水”。花果山水帘洞左侧的“高山流水”和“神泉普润”。“神泉普润”被明顾乾列为《云台山三十六景》，其在三元宫东上一里许，有水帘洞，洞中石泉极浅，而冬令不竭，其水甘美，相传为三元修真之所，郡守王同题字其上。诗曰：“一勺原泉水，长流了不穷。幽深思圣迹，润泽见神功。地脉苍溟接，天源河汉道。相看喷薄处，烟雨落空濛。”纵观王同的榜书，大气磅礴，稳重却不呆板，“采山钓水、抹月批风。”采山钓水语出宋吴潜词：采山钓水美而鲜，意为采山货，钓河鱼，味道既鲜又美。抹月披风语出宋苏轼：“但知抹月披风”诗人以风花雪月为吟诵，以状其闲适。王同受家学影响，书法也宗苏轼，结构端庄，字形微微内敛，撇捺笔画不是很突出，横竖笔画浑厚粗壮，粗细对比不是很强烈，用笔含蓄，笔笔藏锋，状若坐佛。“归云飞鸟”题刻于1546年，较之“采山钓水”题刻晚了2年，但书风却有了较大变化，用笔灵动活泼，点画也不拘泥于具体楷法。伊芦山“奇泉”题刻，二泉毗邻，右清左浊，清则清澈见底，浊则浑然如浆。二泉相通而不相浸，泾渭分明，故“奇泉”也。“含光”镌刻在一个形似金龟的背面，此龟面西，夕阳西下时太阳的余晖照在金龟面部，故“含光”。“含光”、“向朐门”虽是楷书，但有隶书痕迹，笔力雄健。王同爱写榜书是其心意的直接抒发，这正是王同“负奇气”的一种表现。而郁林观东岩上“飞泉”则是竖列，气势如飞流直下的瀑布势不可挡，让人震撼且产生巨大的冲击力。目前，包括王同题刻在内的郁林观题刻群已经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郁林观位于海州区花果山街道飞泉村的“狮子岩”，作者与几位朋友在当地赵先生陪同下曾几度前往考察。此处共计有唐宋明清等16处题刻，分布于近山崖上，其中著名题刻有8处。入门后沿山攀登，右侧直立的一块天然石碑上，有宋祖无择三言诗，镌刻于北宋庆历甲申(1044年)。往前不远的右侧，直立石岩上方镌刻着清黄道传的隶书“垂虹溅雪、漱玉喷珠”。在此下方镌刻着北宋文学家石曼卿诗(1107年)。再往前不远处的左侧，是唐开元七年(719)镌刻的“东海县郁林观东岩壁记”，为海州司马崔惟怦之子崔逸撰文，是一篇文字优美的描述云台山风景名胜的游记，书法风格颇似“石门颂”，被宋赵明成收录于《金石录》，向为历代金石家所重视。在东岩壁上，镌刻王同的“飞泉”大字，470多年的历史沧桑，并未风化其面貌，仍非常清晰，仿佛像新刻一般，苍劲有力。在其下方的坡形石上有王同题刻的“采山钓水、抹月批风”，被树藤缠绕，水渍痕迹较重，示人其沧桑感。下方左侧有现代教育家叶圣陶先生于1977年题刻的“唐隶宋篆”。在“飞泉”北侧招崖前有“古愚子听琴处”六个隶字，此为清朱照题刻。上述题刻作品虽经历多年的风雨侵蚀，但保存完好，是海州古今题刻作品中的上乘之作，是书法艺术之瑰宝。明顾乾将此列为《云台山三十六景》之十一，即仙宫碑篆。大村郁林观，创自唐开元间，唐宋碑文，遍刻两壁，虽苔藓斑驳，不可尽识，而金薤琳琅，著名远近，求拓本者殆无虚日。诗曰：“为访名碑篆，来游仙观中，半阶芳草绿，一径野花红。石古莓苔积，文残冷翠丛。徘徊潜玩久，方识故书工。”

清雅秀气的小楷

至目前为止，王同存世的纸质墨迹尚未发现。现存的“海州镇远楼记”碑或许是最能体现王同楷书笔法精神。“镇远楼记”碑，十一行，每行二十六字，笔画精到，刻工亦佳，可见王同楷书之功力，在王同家乡亦有楷书题刻碑至今留世。古时知识分子要想步入仕途跻身官场，首先要先过书法这一关，特别是明清两代，出于考试、书写奏章的需要，形成了一种新的书体“馆阁体”。“馆阁体”严整精到、森严法度。王同弱冠之年便能中举，其书法之功力不容小觑，明代中晚期书法强调直抒心意，崇尚浪漫主义风格。“笔墨当随时代”，作为一位有自身艺术思想的文人士大夫，王同当然是晚明书风的忠实践行者，纵观“海州镇远楼记”通篇清雅大气，字距、行距疏朗别致，结字颀长，用笔舒展，方正严谨，更多了一分儒雅，看得出作者书写时潇洒自如，气定神闲。

古意盎然的篆书

篆书是王同喜爱的字体之一，特别喜爱大字篆书。海州现存两处王同的大字篆书题刻，一处是孔望山“龙洞良宵月照”题刻，内容为：“龙洞良宵月照，黄华满地秋香。此时此会文彦，一觞一咏情长。矗矗山岩曲抱，潺潺朐海东流。明朝分抉城市，琴樽回忆绸缪”。大意是：如水的月光照耀着千古龙洞庵，遍地盛开的菊花散发出淡淡香气。德才兼备的俊英们在此盛会，饮酒赋诗表达着惺惺相惜的情谊。高高山峰静静地在四周环绕，清清的溪水川流不息地奔向东海。想到明天就要分手各向东西，都会记住今天这样诗酒琴画的缠绵情怀。与其说是一首诗，倒不如说是一幅画，读之使人恍如置身于历史的空间，与文人墨客一起徜徉于龙洞之畔，与他们一起分享那优哉游哉的令人陶醉的良辰美景。另一处是白虎山蓬莱庵题刻且体量更大，字数更多。它位于山腰面东石壁，高宽都接近两米，形式与龙洞题刻相仿，内容为：“蓬莱庵，晚鸦栖定山枫静，南雁鸣长海月孤，蓬莱盛传仙迹旧，烟波遥望淼中都。河南郑县中泉王同题(其他略)”。大意是：静谧的夜晚鸦雀归巢，纷乱的山树默默地站立，一轮明月高挂在长空，群雁长鸣着飞向南方。世间广为流传着蓬莱岛上有神仙的踪迹，翘首寻找那烟涛微波中的仙都。篆书在书法中是公认最难写的，在王同家乡亦有大字篆书题刻至今留世。王同篆书字形挺劲灵动，线条似铁如金，中含劲挺，富有弹性，颇有秦汉风范，作品通篇气象茂密丰富，给人以充实、沉着、古雅、安详之感。王同篆书绝无妩媚之态，古意盎然，可谓匠心独具，王同实为名篆书大家。当然，还有“云洞”的行草。而《哀孝妇》题刻(现存于东海孝妇祠)的草书就像是高山流水，一气呵成，让人们领略王同草书的流跌宕落，运转龙蛇之气度。

470多年过去了，人世沧桑，多少风花雪月早已烟云过矣，积淀留存于世只有不朽的文墨之宝。王同是良吏，为海邑人称颂。他为海州留下的书法题刻，实为海州文化史上之幸事。王同在海州的历史长河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他的为官政绩、诗文书法为后人所敬仰赞颂！

探索发现

云台三庵

□ 姚芝庆

史料记载海州地区的寺庙道观高峰时竟达198座之多，其中云台山区就有124座，前顶佛盛、后顶道盛，一时蔚然大观。令人瞩目的是全真庵，蓑衣庵，长春庵，它们东西一线，同属全真，互有密切关联，在道教史上留下了值得一书的一页。

全真庵位于北云台山黄窝风景区入口处。它濒临浩瀚黄海，背倚青翠欲滴的云台山，环境十分优美，一派蓬壶阆苑景象，现存的两块石刻似乎仍在诉说着它过去的盛况。

一块石刻为全真庵三个大字，上有莲花图案覆盖，周边有线条围绕，勾勒成荷叶状，古朴神圣庄严，气度非凡不俗。

另一块石刻则是一首七言绝句“海曲山峨洞府低，蓬壶阆苑海东西。仙人玉女时游集，不让桃源过客迷。”落款为“长春师父作”。这首诗不仅描绘了全真庵优美的独特地理位置，也记述了当时云台山道教互动热烈的交流场面。那么，落款的长春师父是谁？是元代的长春真人邱处机吗？令人猜想。

史料显示，邱处机曾于元太祖十五年，即公元1220年正月率弟子18人跟随元太祖西征。东归后居燕京长春宫(现改名为白云宫)。1227年7月，邱处机病逝于長春宫，留有《磻溪集》《鸣道集》等著作传世。查遍邱处机生前活动轨迹也未见他有曾来过云台山的记载，因此，这位“长春师父”不可能是元代邱处机。

全真庵不远处是中云台山的簑衣庵，20世纪60年代被毁，现今留下一处石刻依稀可辨，“半间石壁能留鹤，一领蓑衣许济人。”元代邱处机曾以蓑衣道人自居，让人误以为元代邱处机曾居此，这块石刻记载的是许济人，显然有别于与邱处机。这位许道人何许人也？有人推测，可能是宋人道士张志朴，因为他的道号是蓑衣师。可惜的是，时间的差异巨大，否定了这种推测。但从道号上看，这位许济人当属于全真教，他的名气和蓑衣庵的影响不可小觑，以至于整个山头被定名为蓑衣山延续至今。

蓑衣庵向西不远处便是南云台山的长春庵。山石上刻有21个大字，“天下第七十一福地，里人吴莹重修立，长春庵邱真人。”它与孔望山上的石刻“第七十一福地”东西遥相呼应，相互生辉，充分体现了道教对云台山洞天福地的赞美。

“里人吴莹重修立。”显然是地方绅士吴氏出资善行所为。明代云台山人顾乾把这块石刻记入了《云台山志》之中，“隔村西北山中，为长春庵遗址，石刻有天下第七十一福地，相传元时邱处机曾居此。”正是这段文字把人们引入了误区，使得元代邱处机曾来过云台山之说成为数百年的讹传。顾乾为明代万历年间人，面对年代久远的长春庵遗址，他也是不能充分肯定的，因此只能用“相传”二字来表达，从中也可以看出他的治学严谨。

“长春庵邱真人”又是谁？从浩瀚的文海中可以寻找出一些雪泥鸿爪的，这位居住在长春庵邱真人名叫邱楚基。

据原江苏省外贸学校教师云台山人杨石青先生记忆，云台山邱楚基为隐居秀才，后出家为道士，著有《楚基文集》一书。他曾见过清末秀才、朝阳人张云书号梅墅主人的《案头随录》七卷转抄《楚基文集》中的一段文字，“朵云飞来，知近有再临云台山之愿。南领云天，依依情切，小院春来，山鸟齐鸣，松花盈榻。若得知音共处，横琴相对，乐何如也。悬榻翘盼，不尽所言。”张云书“因爱其词文俊丽，摘抄作诵读小品。”另据云台山史志专家张义壮老师说，张云书老先生是他的本家四太爷，《案头随录》他也见过。可惜的是《楚基文集》和《案头随录》俱已遗失，只能空留遗憾。

从长春庵石刻的落款上看，邱楚基以邱真人自居，可见他在道教中的地位之高。道教内部把从道者划分为六等，一为神人，二为真人，三为仙人，四为道人，五为圣人，六为贤人。由此可见，这位邱楚基道长若无一定道力，是不会随便自称为“师父”和“邱真人”的，更不可能是伪托的。试想一下，作为一位资深道长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冒用祖师爷的名号？并在光天化日之下镌刻在山石之上？

邱处机与邱楚基只是音同而字不同的两个人，如果不加以比较，是很容易张冠李戴的。

邱处机道号为长春真人，长春子，蓑衣道士，而云台山的邱楚基则称自己为长春师父和邱真人，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不可同日而语。

再从全真庵和长春庵的石刻上看，两处石刻应同出邱楚基一人之手，1、落款为“长春庵邱真人”和“长春师父”实指一人；2、均镌刻在自然山石上，刻面均向阳；3、字体间架结构一致，楷中略含魏隶；4、均无时间落款，格式一致；5、字形大小相差无几，均为阴刻。从这两处石刻可以看出，邱楚基的确是一位实实在在的长期生活和活跃在云台山中一位道长无疑。

如果按照明代云台山人顾乾的“相传”推断，长春庵的主人邱处机大约为元末明初人，他所处时间段正是全真教危难之际。长春真人邱处机去世后由门人李志常执掌全真教。李志常在道佛大辩论失败后不久便去世，一时全真教群龙无首，在这样的历史关键时刻，云台山人邱楚基挺身而出，义不容辞，理所应当地继承了全真教的衣钵，他高举起全真教的大旗，为全真教的复兴作出了应有的努力贡献，其大义凛然的精神是值得赞扬和钦佩的！

云台山道教文化的一时兴盛也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据《后汉书襄楷传》记载，琅琊人宫崇求见顺帝，呈上其师于吉在东海具曲阳泉水上得到的神书一百七十卷，名曰《太平清领书》，此书即是后来的《太平经》。

唐初，著名道士成玄英兽结庐隐居云台山区20余年，潜心道教经典著述，《老子道德经注》和《南华真经注疏》都是在郁州石室完成的。

宋代，官修道藏的《云笈七签》中就指明道教第七十二福地在海州。

元代，云台山区是全真教活动的重要地区，“仙人玉女时游集”正是当时道教活动的真实写照。

明代，天启皇帝亲书“敕赐护国三元宫”和“敕赐护国延福观”，更是把这一地区的道教氛围推向了顶峰。

全真庵、蓑衣庵、长春庵三位一体，其道教文化内涵丰富，目前仍属深藏山中瑰宝，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和研究。